

新时代背景下云南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影响因素*

焦开山 包智明

本文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角度出发,基于最新的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国家认同情况及其相关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少数民族群体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在不同经济水平、文化水平以及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除了民族认同之外,年龄、文化、经济以及政策等因素都显著影响国家认同。本研究认为,在研究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时,需要把研究视角从特殊历史背景或者重大历史事件转向新时代背景下的日常生活,从政治文化精英转向普通社会民众,从侧重于结构性分析转向动态交互分析,从而深刻认识地区、经济、社会、文化、政策以及民族认同等多方面因素及其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对国家认同的影响。

关键词:少数民族 民族认同 国家认同 交互分析

作者焦开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 100081。包智明,云南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邮编 650504。

一、引言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①这一重要方针为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②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核心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即个体在认知上认为自己属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感受,以及在心理、情感上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依恋感和归属感。在新时代背景下,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主要表现就是对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个体的国家认同体现了个体对国家的一种情感依恋,是国家在自我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项目编号:16JJD84001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40 页。

② 参见王延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民族研究》2018 年第 1 期;郝时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民族工作》,《民族研究》2017 年第 6 期。

意识层面上的深度内化与体现。^① 强烈的国家认同对于促进政治稳定、减少社会群体之间的冲突,以及获取不同社会群体对党和国家的支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及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对于进一步提升社会群体的国家意识并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感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多民族国家的背景下,民族认同一直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关于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首先,以往研究大致形成了冲突论与共生论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② 无论是冲突论还是共生论都有其研究上的局限性。一是两者都过分强调了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而忽略了国家认同背后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影响因素,并且大都侧重于理论陈述而较少进行实证考察,从而缺乏对国家认同影响因素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③二是两者都或多或少忽略了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地域背景下多样性问题。其次,以往的相关研究大都基于国家层次或者群体层次去分析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分析单位通常是政治和文化精英、国家政策和历史事件,而非微观层次上的个人。^④ 最后,以往的相关研究长期关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比如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和民族主义运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在已经建立了统一多民族国家中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问题。^⑤

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在研究社会群体的国家认同时,把研究视角从主要的理论陈述转向实证研究,从特殊历史时期转向日常生活情景,从民族精英转向普通民众,利用较大规模的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国家认同情况,我们将不仅考察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且将考察个体的年龄、经济、文化水平,以及政策因素对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影响。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在所有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中,民族身份和民族认同往往被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以中国为例,有研究认为基于中华民族身份的国家认同与其所包含的各个民族群体所持有的民族认同之间存在张力,^⑥族群或民族的多元性与国族的同一性相矛盾,同一性有被多元性替代的风险。如果个体对自己所属民族身份的归属感越强烈并对所属民族的文化、价值和利益的强调越突出,追求和维护民族利益的理论或意识形态以及实践行动就会越多,从而导致对国家认同的削弱甚至发生矛盾。^⑦ 尤其是,当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民族群体在发展机会和发展水平上

① 参见 A. D.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London: Penguin Group, 1991; D. Mill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Cambridge: Polity, 2000。

② 参见郝亚明:《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共生:理论评述与探讨》,《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

③ 参见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④ 参见 F. L. Jones, P. Smith,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Bases of National Identity. A Comparative Multi-level Analysis,"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17, No. 2, 2001。

⑤ 参见 B. Bonikowski, "Nationalism in Settled Time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42, 2016。

⑥ 参见周平:《民族国家认同构建的逻辑》,《政治学研究》2017年第2期;周平:《中华民族研究的国家视角》,《思想战线》2019年第1期。

⑦ 参见贺金瑞、燕继荣:《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存在显著差异并且把这种差距的产生归结于民族因素或者与之相关的国家政策时,就会产生强烈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对国家认同形成某种侵蚀或消极作用。^① 不过,也有研究认为,在不同的国家或者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可能是不一样的。^② 在现代多民族国家中,民族与国家的关系就类似于局部与整体的关系,民族的自我认同是在国家机体内部得以形成和持续的。^③ 一方面,较强的国家认同不会削弱民族认同,反而是民族认同得以形成和延续的前提;另一方面,较强的民族认同也不一定削弱国家认同,这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认同在价值共识和功能上相互依赖,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和谐共存。^④ 虽然中国各民族因不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而保持了民族边界和认同边界,但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融合过程中,各民族的集体记忆逐渐汇聚整合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记忆,^⑤从而具有了共同体的文化根基,为建立在民族认同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或者国家认同提供了历史和文化依据。

综合以上两种观点,笔者认为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以及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中都可能存在差异。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是冲突的还是共生的,^⑥两者之间的关系模式可能是多样的。最近的一些实证研究发现,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国家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表现出多种的形式,在一些国家中两者之间是正相关的,而在另外一些国家中两者之间是负相关的,也有一些国家中两者之间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关系。在一个国家内部照样存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关系的多种形式。^⑦ 在一些社会群体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较高,另外一些社会群体中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都较低,也有一些社会群体的民族认同较高而国家认同较弱或者民族认同较弱而国家认同较高。^⑧ 由此可见,人们会根据各自的社会与文化环境而不断转换或者变化着自己的社会认同,在同一个民族群体内部,民族认同的强度及其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都可能是不同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调节,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社会群体的经济地位、文化水平等,而以往的研究恰恰在这个方面上忽略了或者在某种程度上过度简化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而没有看到两者关系的复杂模式以及背后的多种影响因素。^⑨

除了民族身份或者民族认同之外,还存在一些其他的重要因素影响着国家认同。首先,社会经济地位显著影响了人们的国家认同意识,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英格尔哈特(R. Inglehart)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理论”。对于经济和物质上还处于匮乏的人们而言,对来自国家的保护需求更高,从而国家认同感比较强烈,而对于那些在经济和物质上充裕的人们而言,对来自国家的保护需求较低,这会导致国家主义或者爱国热情的降低。通过对世界上43个国家的

① 参见邓新星:《论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感的建构》,《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② 参见J. S. Phinney, A. D. Ong, “Conceptualization and Measurement of Ethnic Identity: Current Status and Future Directions,”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Vol. 54, No. 3, 2007。

③ 参见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

④ 参见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⑤ 参见麻国庆:《记忆的多层性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民族研究》2017年第6期。

⑥⑨ 参见王延中:《建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间的和谐关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5期。

⑦ 参见J. S. Phinney, G. Horenczyk, K. Liebkind, et al., “Ethnic Identity, Immigration, and Well-being: An Interac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Vol. 57, No. 3, 2001。

⑧ 参见J. W. Berry, J. S. Phinney, D. L. Sam, et al., “Immigrant Youth: Acculturation, Identity, and Adaptation,” *Applied Psychology*, Vol. 55, No. 3, 2006。

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英格尔哈特(R. Inglehart)发现低收入国家的民众比富裕国家的民众有更强列的国家认同,在一个国家内部,经济状况较差的群体也比经济状况较高的群体有更强列的国家认同。^① 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也认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精英人群更重视全球认同而国家认同相对较弱。^② 最近一项针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在较高收入水平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群体中,国家认同感相对较弱,但是这主要体现在青年一代。然而,该研究同时也发现中国社会的优势地位阶层群体的国家认同感要高于中间阶层和较低的社会阶层群体,这与在国外研究的结论不太一致。^③ 也有研究从认知水平和能力上来解释国家认同与社会经济地位的关系。相较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往往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其接触更广范围文化的机会也相对较多,从而更有可能把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大群体成员的一部分,^④更有可能对国家产生认同感。由此可见,社会经济地位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否存在差异,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

以往也有研究考察了民族政策对国家认同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针对少数民族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安排,比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等。有研究认为,这些政策和制度安排唤醒和强化了人们的“民族意识”,其中针对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虽然保障了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利,但是也可能强化了民族之间的边界和少数民族精英分子的民族意识,从而导致民族利益意识也不断提升,进而有可能对国家认同产生冲击,因此建议把新中国以来在民族问题上的相关政策“去政治化”,培养和强化国家意识,逐步淡化民族意识。^⑤ 不过,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不仅没有限制少数民族群体在社会资源分配上的机会,一些所谓的少数民族优惠政策反而增加了少数民族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也减缓了因为市场竞争而带来的相对剥夺感,尤其对于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更是如此。随着我国社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那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因为国家的民族政策而得到某种程度的社会保护,并从这种社会保护中获得自我的价值感和认同感,从而更有可能将自己视为国家的一部分,对国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也会上升。^⑥ 因此,作为社会再分配的民族政策在某种程度上会缓解社会不平等,能够增加少数民族群体对国家共同体的依恋。^⑦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我们发现国内学术界虽然对国家认同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是大部分研究仍然处于理论层面的讨论,而较少对国家认同背后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虽然一些研究讨论了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但是以往研究较少考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和空

① 参见 R.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② 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新华出版社2010版。

③ 参见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④ 参见 R. M. Kunovich,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4, 2009.

⑤ 参见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⑥ 参见 M. Shayo, “A Model of Social Identity with An Applica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Nation, Class, and Redistribu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3, No. 2, 2009.

⑦ 参见 K. J. Han, “Income Inequality,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nd National Pride: A Test of Social Identification Theor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25, No. 4, 2013.

间背景下两者之间复杂的关系模式。如图 1 所示,在研究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时需要考虑所处的历史背景和国家的发展水平。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国家内部与民族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制度安排可能会存在差异,而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影响到少数民族群体在整个国家或者社会中的地位。此外,在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国家所给予个体的资源和机会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个体对国家依赖的程度也是不同的。因此,基于特定历史阶段或者历史事件下的国家认同研究结论可能不适用于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日常生活情景。此外,由于社会化过程不同,以及在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和对国家相关政策的认知上都可能存在差异,个体在认知思维特质、拥有的社会资源和机会以及对国家的依赖程度上都可能存在显著差异,而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到个体对本民族的认同,进而影响到对国家的认同感。因此,研究视角也需要从政治文化精英转向普通社会民众。鉴于此,本文将考察中国新时代背景下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不仅考察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且还重点考察个体的年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政策了解情况等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与民族认同的交互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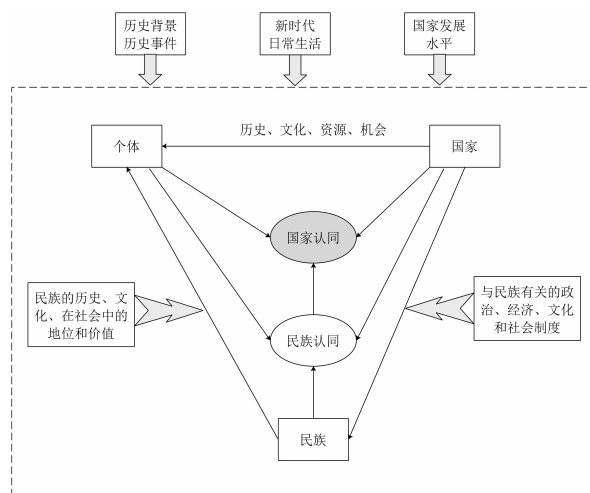


图 1 本文的研究视角和框架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建设关键问题研究”课题组于 2018 年在云南省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抽样调查。本次调查把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大于等于云南省平均水平(33.39%)的县(区)定义为抽样的总体,总共 69 个县(区),构成了初级抽样单位。根据每个单位的非农人口比例把抽样总体分为了三个层级,然后根据人口规模采用概率比例抽样(PPS)从每个层级中抽取了 12 个县级单位,总共抽取了 36 个县级单位。36 个县级单位的所有街道、乡镇构成二级抽样框,单位数为 398 个。根据街道或乡镇的总人口规模,按照 PPS 从 398 个乡镇单位中抽取了 160 个乡镇。最后,再从 160 个乡镇中随机抽取一个村(居)委会,共 160 个村(居)委会。在每个被抽中的村(居)委会中,按照系统抽样的方法抽取 25 户家庭。最后,在被抽中家庭的成年人中随

机抽取一名成年人进行访问。在剔除汉族样本和不符合要求的样本后,本研究所使用的样本量为2889人。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包含了较大规模的少数民族样本。

(二)变量及其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国家认同,包括了个人对国家的认知和情感等,它描述的是个人对所属国家的感情强度和依恋程度,其主要表现为对国家的归属感、自豪感、忠诚、爱以及关心。它是根据受访者对四个关于国家的看法与感受问题的回答结果进行测量:(1)我曾花时间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和习俗;(2)当别人批评我们国家的时候,我觉得像在批评自己;(3)我为自己是中国人感到自豪;(4)我每次听到国歌的时候会很激动。对于每个问题,可供回答的选项共有4个,分别是“不符合”(编码为1)、“一般”(编码为2)、“比较符合”(编码为3)和“非常符合”(编码为4)。这个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值为0.75,信度较高,可以用于构建一个国家认同感综合指数。为了计算这个综合性指数,本研究首先用这四个测量指标拟合一个等级项目反映模型(Graded response model),然后,根据此模型计算了一个国家认同感指数变量。^①这个变量值越高,说明国家认同感越强烈。

在本研究中,将民族认同界定为个人对所属民族的感情强度和依恋程度,主要表现为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归属感、自豪感。它是根据受访者对四个关于本民族的看法与感受问题的回答结果进行测量:(1)我曾花时间去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习俗;(2)我对自己的民族身份感到自豪;(3)当别人对本民族有歧视或者敌意时,我通常用激烈的言语或行动予以回应;(4)你认为民族身份重要吗?对于前三个问题,可供回答的选项共有4个,分别是“不符合”(编码为1)、“一般”(编码为2)、“比较符合”(编码为3)和“非常符合”(编码为4)。对于第四个问题,可供回答的选项共有4个,分别是“不重要”(编码为1)、“一般”(编码为2)、“比较重要”(编码为3)和“非常非常”(编码为4)。经计算,民族认同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值为0.66,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样,首先用这四个测量指标拟合一个等级项目反映模型,然后根据此模型计算了一个民族认同指数,民族认同指数越高说明民族认同感越强烈。

本研究对文化水平的测量侧重于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文化技能,而不仅仅是学历背景。文化水平量表一共有七个测量指标:受教育程度(1=文盲,2=小学,3=初中,4=高中及以上)、听普通话的能力(1=非常差,2=差,3=一般,4=好,5=非常好)、说普通话的能力(1=非常差,2=差,3=一般,4=好,5=非常好)、平时阅读报纸情况(1=没有,2=较少,3=一般,4=较多)、平时阅读杂志情况(1=没有,2=较少,3=一般,4=较多)、平时用电脑上网情况和平时用手机上网情况(1=没有,2=较少,3=一般,4=较多)。经计算,文化水平量表的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值为0.78,信度较高。同样,我们根据等级项目反映模型计算了一个文化水平指数,文化水平指数值越高说明文化水平或者文化技能越高。

对经济水平的测量不仅包括了收入情况,也包括了消费和资产情况,一共有六个指标,分别是家庭人均年收入、家庭人均年消费支出、家庭是否有汽车(0=没有,1=有)、家庭是否有冰箱(0=没有,1=有)、家庭是否有洗衣机(0=没有,1=有)。根据样本百分位数,本研究把家庭年人均收入和家庭年消费支出划分为四个类别:较低(低于25%分位数)、中下(在25%分位数和50%分位数之间)、中上(在50%分位数和75%分位数之间)、较高(高于75%分位数)。经

^① 根据模型计算的国家认同感指数变量是一个所谓的潜变量,服从均值为0,标准差为1的正态分布。关于此模型的具体介绍,可参见R. J. D. Ayala,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Item Response Theory*,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08.

计算,经济水平量表的克伦巴赫(Cronbach's alpha)信度系数值为 0.65,信度在可接受范围内。同样,我们根据等级项目反映模型计算了一个经济水平指数,其数值越高说明家庭经济状况越好。

对民族政策的了解,我们用了七个指标进行了测量。我们一共列出了七项我国实施的民族政策,分别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策、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政策、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文字政策、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以及少数民族升学加分政策。对于每一项政策分别询问了受访者的了解程度(1=非常不了解,2=不了解,3=一般,4=了解)。这七个指标的克伦巴赫信度系数值为 0.91,信度很高。同样,根据等级项目反映模型计算了一个民族政策指数,其数值越高说明受访者越了解民族政策。

本研究的自变量还包括了性别、年龄等变量。其中,性别是一个虚拟变量,其中 1=女性,0=男性。年龄是一个时变变量,取值范围在 18 岁到 87 岁之间。

(三)模型

由于本数据是一个多层次的数据结构(县级单位>>社区单位>>个体单位),我们采用了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mixed-effects linear regression)。如下所示:

$$y_{ijk} = \beta_0 + \beta_1 x_{1ijk} + \sum_{p=2}^p \beta_p x_{pijk} + (u_k + u_{jk} + e_{ijk})$$

其中 i 表示层一单位,即受访对象, j 表示层二单位,即社区单位, k 表示层三单位,即县级单位。 y 为国家认同指数变量, x_{1ijk} 为民族认同指数变量, x_{pijk} 为其他自变量。 u_k 为层三单位上的残差,表示县级单位的效应。 u_{jk} 是层二单位上的残差,表示社区单位的效应。在本研究中,模型的截距系数被认为是一个随机变量,在县级单位和社区单位内发生波动,假定服从期望值为 0 的正态分布。 e_{ijk} 表示层一单位上的残差。^①

四、研究结果

表 1 给出了多层次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通过综合比较模型的拟合度,我们认为模型 4 是相对较优的模型,下面根据模型 4 的估计结果进行解释。根据模型 4,女性的回归系数为-0.09 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这表明女性的国家认同程度要显著低于男性。年龄的回归系数为 0.003,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国家认同程度也会显著增强。另外,我们也看到民族认同与年龄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估计为-0.001,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不具有显著性,这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会没有显著的变化。

表 1 多层次混合效应线性回归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固定参数				
女性	-0.228*** (0.033)	-0.143*** (0.027)	-0.089*** (0.027)	-0.090*** (0.026)
年龄	-0.008*** (0.001)	-0.005*** (0.001)	0.003** (0.001)	0.003*** (0.001)

① 在估计模型时,我们采用了 Stata 统计软件的 meglm 命令进行估计。

民族认同		0.591*** (0.016)	0.535*** (0.016)	0.513*** (0.017)
经济水平			0.031* (0.019)	0.040** (0.019)
文化水平			0.162*** (0.019)	0.144*** (0.019)
民族政策			0.111*** (0.016)	0.109*** (0.016)
民族认同×年龄				-0.001 (0.001)
民族认同×经济水平				-0.045** (0.019)
民族认同×文化水平				-0.014 (0.019)
民族认同×经济水平×文化水平				-0.055*** (0.017)
民族政策×文化水平				0.010 (0.014)
民族认同×民族政策×文化水平				0.079*** (0.014)
截距	0.084 (0.052)	0.068 (0.043)	0.047 (0.039)	0.049 (0.038)
随机参数				
层三方差(截距)	0.067*** (0.021)	0.047*** (0.014)	0.037*** (0.011)	0.035*** (0.011)
层二方差(截距)	0.030*** (0.009)	0.023*** (0.006)	0.014*** (0.005)	0.013*** (0.005)
层一方差(截距)	0.691*** (0.019)	0.460*** (0.012)	0.432*** (0.012)	0.426*** (0.011)
模型拟合指标				
自由度	2	3	6	12
对数似然值	-3637.700	-3052.237	-2950.216	-2927.805
AIC	7287.399	6118.474	5920.432	5887.610
BIC	7323.211	6160.255	5980.119	5983.109

在模型4中,经济水平的回归系数估计为0.04且统计上非常显著,这表明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群体的国家认同程度也会显著提高;民族认同与经济水平的二维交互项回归系数估计为-0.045,民族认同、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的三维交互项回归系数估计为-0.055,这表明经济水平对国家认同的影响在不同的民族认同和文化水平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如图2所示,对于文化水平和民族认同都低的群体而言(图2左上角的最下面一条直线),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其国家认同程度只有微小的下降,可以说在这个群体中经济水平与国家认同之间几乎不存在显著关系;对于文化水平低但是民族认同中等和高的群体而言(图2左上角的上面两条直

线),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其国家认同程度是逐渐增强的,这表明经济水平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正向的;对于中下文化水平群体而言(图 2 的右上角),无论民族认同水平如何(图 2 的右上角的三条直线),其国家认同程度都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增强,这表明在这个群体中经济水平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正向的;对于文化水平较高和民族认同高的群体而言(图 2 的下半部分最上面的一条直线),其国家认同程度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逐渐减弱。但是,对于文化水平较高但是民族认同中等及以下水平的群体而言,其国家认同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逐渐增强。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也可以认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水平群体中也存在显著差异。如图 2 所示,在文化水平低的群体中(图 2 的左上角),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逐渐扩大。也就是说,在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低的群体中,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相对更小,这说明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文化水平低但经济水平高的群体中,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相对更大,这也说明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大。此外,图 2 也显示,在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中(图 2 的下半部分),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逐渐缩小。也就是说,在文化水平和经济水平都较高的群体中,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相对更小,这说明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小,而在文化水平高但是经济水平低的群体中,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相对更大,这也说明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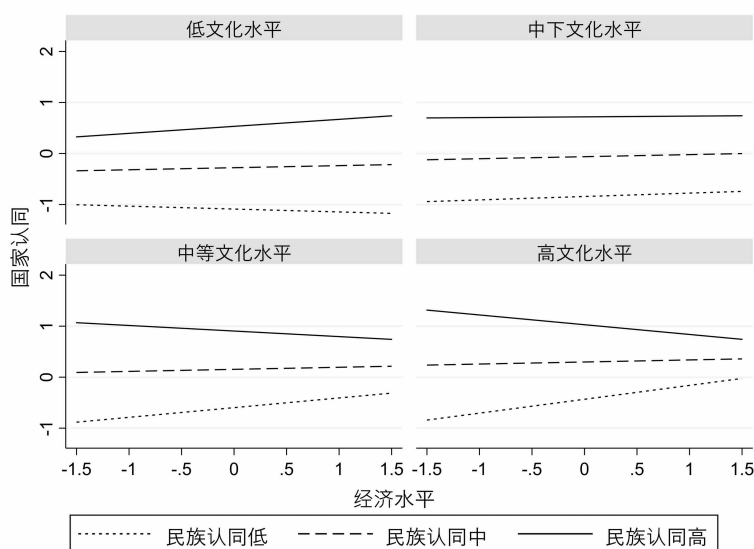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文化水平群体中的经济水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在模型 4 中,文化水平变量的回归系数估计为 0.144,这表明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国家认同感也会逐渐增强。为了进一步考察文化水平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我们根据模型 4 计算了不同经济水平群体中的文化水平、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情况。如图 3 所示,在经济水平和民族认同水平都高的群体中(图 3 右下角的最上面一条直线),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其国家认同程度并没有显著增加,除此之外的其他群体中,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其国家认同程度都是逐渐增强的。此外,图 3 也显示,在经济水平低的群体中(图 3 左上角),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不同

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逐渐增加,也就是说,在经济水平低但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中,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是最大的,这表明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是最大的。在经济水平较高的群体中(图3下半部分),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逐渐缩小,也就是说在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都高的群体中,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是最小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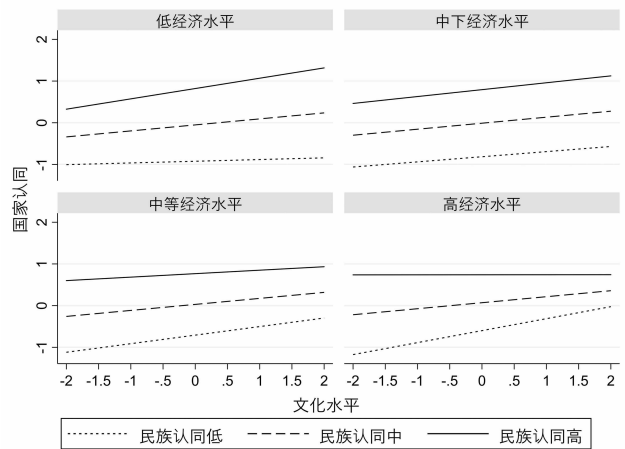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经济水平群体中的文化水平、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在模型4中,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回归系数估计为0.109且统计上非常显著,这说明个体对我国民族政策越了解,其国家认同程度也会越高。不过,根据模型4中民族政策与民族认同、文化水平的三维交互项系数估计结果看,在不同的文化水平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中,民族政策了解程度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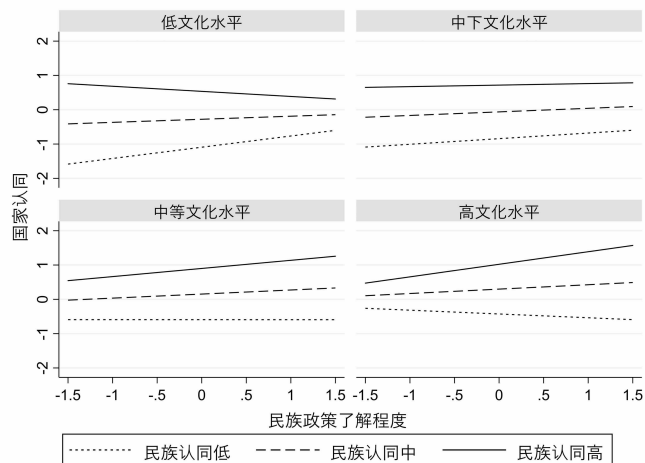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文化水平群体中的民族政策了解、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如图4所示,在文化水平低但民族认同水平高的群体中(图4的左上角的最上面一条直线)以及在文化水平高但民族认同水平低(图4右下角的最下面一条直线)群体中,随着对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上升,其国家认同程度也逐渐下降。在文化水平不低且民族认同水平高的群体中,随着对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上升,其国家认同程度也是逐渐增强的。而对于那些文化水

平低且民族认同水平也低的群体而言(图4左上角最下面一条直线),随着对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增加,其国家认同程度也会逐渐增强。对于民族认同处于中等水平的群体而言,无论其文化水平如何,随着对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增加,其国家认同程度都会逐渐增加。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在低文化水平群体中(图4的左上角),随着对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增加,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逐渐缩小,这表明在文化水平低但是对民族政策了解程度较高的群体中,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小。不过,在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中(图4的下半部分),不同民族认同水平群体在国家认同上的差距逐渐扩大,这表明在文化水平较高并且对民族政策了解程度也较高的群体中,民族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相对较大。

五、结论与讨论

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某种程度上指称国家共同体,因此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是就增强对国家共同体的认同感。要增强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就需要全面并且深入地考察与国家认同有关的影响因素或者相关因素。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把焦点集中在新时代背景下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国家认同及其相关因素,这使得我们的研究更具现实性和时代性。此外,本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包含多个民族群体的抽样调查数据,不仅对相关的理论观点进行了验证,也为解决一些理论争论提供了实证依据。最后,与以往大部分研究只侧重于考察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二元线性关系不同,本研究基于交互性的视角考察了年龄、经济、文化、政策等因素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以及这些因素与民族认同的交互效应。

第一,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国家认同水平也逐渐增加。这一研究结果与最近的一项针对全国性样本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①与年轻人相比,年长的人之所以有相对更高的国家认同,可能与所经历的社会化过程和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关。^②根据社会化理论,人们的社会态度是在生命早期形成并在此后基本保持稳定。以六七十岁的老年人为例,他们生命的早期正好处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物质生活非常匮乏,因此对经济增长和物质安全的需求非常强烈,从而形成了物质主义价值观,^③对国家的依赖较强,也能深切地感受到国家快速发展所带来的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提高,由此对国家认同感也比较强烈。此外,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际形势处于冷战对峙阶段,加上广泛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人们的国家意识非常强烈,而民族意识相对薄弱。与之相反,现在的年轻人处于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时代,生活水平和福利保障都相对较高,更可能秉持一种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国家所给予的经济和人身安全习以为常,加上全球化和国际形势的缓和,年轻人相比上一代人较少感受到外国对本国的威胁。这可能会导致国家意识和爱国主义热情有所降低。

第二,本研究结果显示,在大部分社会群体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个体的国家认同水平

^① 参见李春玲,刘森林:《国家认同的影响因素及其代际特征差异——基于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② 参见 S. J. Schwartz, I. J. Park, Q. -L. Huynh, et al., "The American Identity Measur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Across Ethnic Group and Immigrant Generation," *Identity*, Vol. 12, No. 2, 2012.

^③ 参见 R. Inglehart,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逐渐增强。这一研究结果与以往一些研究的结论不太一致。以往有研究认为低收入群体的国家认同感相对更为强烈,^①不过这些研究结论大都基于高收入国家样本,可能不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当前,我国经济水平较高的社会群体也是过去四十年国家改革发展的主要受益群体。这种在经济上的成功被认为是走向社会融合的关键,^②从而不断增加对社会和国家的积极态度,也倾向于把自己的经济成功和国家的发展联系起来,尤其对于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更是如此。不过,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文化水平低的社会群体中,经济水平与国家认同之间几乎不存在显著性关系,这可能与此类社会群体的思维特质有关。对于文化水平较低(比如文盲)的社会群体而言,他们的类别化思维水平相对较低,缺乏自我类别化的定义和社会类别的构建,往往依据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情而不是简单地根据一个广泛的类别进行思考。因此,无论经济水平如何,这类群体对于自我认同、民族认同以及国家认同往往都没有明确的认识或者相对不重要。^③

第三,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水平对国家认同有非常显著的效应,随着文化水平的提升,国家认同程度也逐渐增强。虽然一些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表明,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更多地持有一种全球化视角而对所属国家的认同相对较弱,^④但是我们不能说教育水平的提高削弱了国家认同,可能只是影响了国家认同的方式,从一种强烈价值判断和情感涉入的国家认同转向了相对独立评价和理性的国家认同,^⑤从一种封闭排外的国家认同转向了开放包容性的国家认同。^⑥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其认知水平也可能会逐渐提升,对大众文化的消费也逐渐增多。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个体能够在一个更大的社会范围里定义自我,也就是把自我想象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群体的一部分。^⑦此外,语言作为社会认同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熟练使用普通话对于了解主流文化、与更广泛的社会群体进行交流以及更深入地融合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而更多的社会接触和社会融入与更高的国家认同有关。^⑧

第四,本研究结果显示,从整体上看,我国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对于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这一研究结果与一些理论研究所获得的结论不太一致。^⑨在本研究看来,我国实施的一系列少数民族政策,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提升了民族意识,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少数民族群体提供了社会保护,减缓了因为社会竞争而带来的相对剥夺感,而

① 参见 R. M. Kunovich,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4, 2009。

② 参见 M. M. Gordon, *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 The Role of Race, Religion, and National Origi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③ 参见 S. Rosenberg, P. Beattie, "The Cognitive Structur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dentifying as Americ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5, No. 1, 2019。

④ 参见 Z. Elkins, J. Sides, "Can Institutions Build Unity in Multiethnic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101, No. 4, 2007; B. Bonikowski, P. DiMaggio, "Varieties of American Popular Nation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1, No. 5, 2016。

⑤ 参见 S. Rosenberg, P. Beattie, "The Cognitive Structuring of National Identity: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Identifying as America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25, No. 1, 2019。

⑥ 参见 B. Bonikowski, P. DiMaggio, "Varieties of American Popular National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81, No. 5, 2016。

⑦ 参见 B.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Verso Books, 2006。

⑧ 参见常宝宁:《新疆南疆地区青少年国家认同影响因素实证研究》,《新疆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⑨ 马戎:《理解民族关系的新思路》,《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这些可能会显著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不过,本研究结果也显示民族政策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在不同的群体中也存在一些差异。在文化水平低并且民族认同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了解程度并没有显著提升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低文化水平使得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了解可能存在偏差或者存在误解的情况,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从少数民族政策中获益相对较少并由此对国家的少数民族政策不太满意,从而影响到国家的认同。此外,本研究结果也显示,在文化水平高但是民族认同低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对少数民族政策的了解程度也没有显著提升甚至还削弱了对国家的认同感。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类少数民族群体无论对于本民族还是对国家的认同感都低,其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处在一种相对疏离的状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为高文化水平使得对少数民族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偏差了解得更多一点,从而对国家实施的少数民族政策持一种批评的态度,这可能也会影响到对国家的认同。

第五,本研究结果显示,民族认同水平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水平较高的群体其国家认同程度也会相对更高。我们可以从历史因素、社会结构性因素、社会心理因素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进行解释。首先,在中国新时代背景下,至少在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导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紧张关系的结构性因素并不显著存在。比如,以往研究发现不同民族群体在政治上的不平等是破坏国家认同的重要结构性因素,^①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却保障了各民族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或者说不存在显著的差异。因此,政治不平等所导致的认同张力在中国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是不存在的。其次,以往有研究认为如果一些民族群体感知到的民族歧视越高,其民族认同水平会越高而国家认同水平会越低。^②然而,这种对某一民族群体的整体性社会歧视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并不存在。其次,中国存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互促进的历史与现实条件。比如,中国一直坚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③各民族群体的文化特性在一体格局下能够继续得到保持和尊重,各民族群体都被视为同等地位的社会群体,其中没有一个民族群体能够支配任何其他民族群体,由此个人可以同时对国家和民族产生认同感,其中对一个方面的认同实际上有助于加强对另外一方面的认同,两者之间可以相容并且相互强化。^④再次,中国经过70年的发展,其国家实力和水平已经能够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而且在控制城乡、区域等因素后不同民族群体在公共服务可及和利用的机会上基本是均等的。这可能会增加不同民族群体对国家的正向态度。最后,新中国的建立并不像欧洲许多民族国家都是围绕着某一个民族群体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以中华民族的名义建立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同民族群体会把自己看作是整个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

本研究也进一步发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正相关关系在不同经济水平、文化水平以及少数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群体中也存在显著差异。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的高低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文化水平较低但是经济水平较高的社会群体中或者

① 参见 S. Ray, "Ethnic Inequality and National Pride,"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39, No. 2, 2017.

② 参见 L. E. Molina, N. L. Phillips, J. Sidanius, "National and Ethnic Identity in The Face of Discrimination: Ethnic Minority and Majority Perspectives,"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Vol. 21, No. 2, 2015.

③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④ 参见 M. Verkuyten, B. Martinovic, "Immigrants'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Meanings, 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 *Social Issues and Policy Review*, Vol. 6, No. 1, 2012.

在经济水平较低但是文化水平较高的群体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都相对更强一些。这说明经济上的成功或者文化水平的提高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提升群体的自我类别化定义和社会认同建构,进而同时提升群体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同时,我们也发现在经济水平和文化水平都较高的社会群体中,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关性在下降。这说明在社会精英群体中,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只是其众多社会认同的两个方面,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既不相互强化也不相互矛盾,而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关系。最后,我们也发现少数民族政策对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也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对于文化水平较低且对少数民族政策有较多了解的少数民族群体而言,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关性在下降。这说明在文化水平较低或者说社会认知能力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中,通过对少数民族政策进行广泛的宣传以此加深少数民族群体对其的了解程度,无论对于民族认同较高还是对于民族认同较低的少数民族群体,都会增强对国家的认同感。至于文化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我们发现随着对少数民族政策了解程度的增加,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相关性逐渐增加。这说明在社会认知能力较高的少数民族群体中,少数民族政策可能会同时激发他们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能不存在以往研究所说的少数民族政策只单方面激发民族认同的情况。

最后,本研究面临的限制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家认同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包括心理、文化、社会、政治等多个维度。本研究对国家认同的测量侧重于心理和文化维度,而对政治维度的测量和考察不足。因此,本研究的结论不适于讨论一些与政治相关的议题。(2)虽然本研究依据统计上的交互效应分析考察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变动情况,但是对于不同的民族群体和个体而言,其内在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可能具有不同的涵义,两者的优先顺序也可能存在差异,在不同的生活情景中究竟哪一种认同的作用更突显,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开展研究。(3)正如本研究所示,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存在差异。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来自于云南省的少数民族地区,其结论是否适用于其他少数民族地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群体仍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责任编辑 马俊毅〕